

CHAPTER 9

为什么能
使各民族
和睦相处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世界。目前全世界共有近200个国家，民族却有2000个以上，绝大多数国家由多民族组成；约有几百种不同的宗教，信教人数达48亿，约占世界60亿人口的81%。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国际政治的两大难点和热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动荡、冲突、战争大都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05年，全世界共发生332起比较大的纠纷、冲突和战争，其中因民族、宗教原因引发的就有278起，占总数的83.73%。当今世界，各种形式的民族、宗教纠纷在全球不断上演：或族际冲突、国家裂变；或宗教战争、兵戎相见。一片纷扰中，有着56个民族和多种宗教的中国，却始终保持着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外国学者把这“令人吃惊的统一”看做是“中国神话”。⁷⁸那么，“中国神话”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中国目前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91.51%，⁷⁹其他55个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为“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交流融合、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中国众多的民族，既不是由一个民族集团衍生而来，也不是只发端于某一个地区，在起源上有着多元的特点，呈现“满天星斗”的景象。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各民族经过不断的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除一小部分民族由于融合、战争以及改换名称等原因消失在历史烟尘中外，大多数民族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单元。比如，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其形成始于夏朝。到秦统一时，原散布于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之中。在汉族形成以后的2000多年里，周边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特别是当少数民族建立中原政权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该民族大规模地融入汉族。同时，几千年来，也有许多汉族人融入少数民族之中。典型的如楚国灭亡后，进入云南地区的庄蹻和他的军队“变其服，从其俗”，融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著名学者梁漱溟在《问答录》中提供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具体例子。他说：“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宋代皇帝顺帝携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未走，留在河南汝阳，改汉姓梁。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500余年，

历史的
轨迹

中国
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⁸⁰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纯种’。”⁸¹

江河滔滔，奔流入海。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方向是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汇聚成为稳固的中华民族。今天中国的疆域和版图，是中华大家庭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开发形成的。汉族的祖先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藏、羌族最先开发了青藏高原，彝、白等民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满、锡伯、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祖先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先后开发了蒙古草原，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最先开发了台湾岛。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以中原族体为核心的滚雪球运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各民族早已以中原为中心，相互接近、相互交往，渐成统一之势。秦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进一步打破了各民族间封闭隔离的状态，接触更加频繁，交往更加增多，联系更加紧密。各民族在历经迁徙、贸易、婚嫁，以及碰撞、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之后，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逐步形成了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格局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痛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和救亡图存的共同使命把中国各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特别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中华民族自觉联合起来，“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最终赢得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百余年抵御外侮的共同行动中，

各民族爱国一家、团结奋斗的意识空前觉醒，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得到了进一步激发和增强，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特征更加凸显，从而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最终发展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日本人说：“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⁸²“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⁸³



2008年3月10日，在北京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八位少数民族代表接受记者集体采访。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今天，中华民族已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概念和归属，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统称。凡居住和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民族，包括现有的和历史曾经存在过的，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一词虽晚至20世纪初才出现，却凝聚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和高度概括。

那么，是什么把中华民族的“满天星斗”的“多元”最终融合为牢不可破的“一体”？

拨开历史的层层帐幕，拂去岁月的重重尘埃，可以发现，把中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世代传承的纽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中国的周边地带分别是高山、浩海、大漠和戈壁，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阻隔了与区域外交通的同时，又有利于区域内各民族的密切交往。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融合后，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插花式分布格局。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块田，同饮一河水，共生互补。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格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理念就逐渐形成。自秦朝开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以来，国家基本上维持着统一的局面，而且不断发展和巩固。这期间，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国家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存在，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强化了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指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⁸⁴

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由于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形成了互补互济的经济联系。“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进一步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绢马互市、茶马互市……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经济的天然联系都不曾中断。这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联系，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域外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不以血缘论夷

夏,而以文化论亲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传播和影响,对各民族的亲近与融合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中国是“多元”凝成的“一体”,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开拓保卫了祖国的疆域,共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文化,从而血肉相连、结成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正是这样的历史以及客观存在的现实,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就在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不分民族,均可接收为党员”。⁸⁵简短的11个字,蕴含着中共对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这11个字,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问题上的民族平等原则,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民族,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此决定了这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神圣使命就是团结中国各民族共同奋斗,谋求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史无前例的创举”

1949年，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新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才能长期有效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思考，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了联邦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却没有照搬“老大哥”的经验，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理论，创造性地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新中国确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创举”。⁸⁶

中共执政的新中国为什么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向政协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有过解释。他说：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如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对台湾及海南岛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⁸⁷

周恩来的讲话，至少从一个主要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不用联邦制而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共和国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周恩来后来进一步指出：“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

况,不能照抄别人的。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⁸⁸

不采用联邦制,除了防止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正如2005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所指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依据;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各地区资源条件和发展的差距,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条件。”⁸⁹

由此,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解放的蒙古族地区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中国国土面积的64%。此外,中国还建立了1100多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统一,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6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合乎国情的正确选择,把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断

称为“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当之无愧的。

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关系着国家的政局稳定乃至生死存亡。苏联的分裂解体，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诸国的分崩离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年这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留下的隐患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正是从这些国家的宪法关于各民族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中找到分裂的借口，策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依据“民族自决”原则重新分配欧洲版图建立不同的“民族国家”时作了一段中肯的评说：“将这块语言民族纷杂的是非之地，整整齐齐地分为一个个民族国家，对隔岸观火的外人，自然不觉有何不妥。然而，民族自决说来简单，如此划分的后果却惨不忍睹，带来的灾难一直到90年代欧洲还没有结束。90年代将欧洲大陆裂为寸断的诸国冲突，事实上正是当年《凡尔赛和约》作下的孽啊！”⁹⁰

换位思考，如果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时选择了联邦制，中国很可能就不会是今天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中国。总结历史的经验，邓小平深有感触：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没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⁹¹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为世界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2009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斯里兰卡代表向中国提出了一个要求——“与全世界分享如何把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与区域民族自治相结合的经验”。⁹²

开明的民族政策

1954年9月15日，一个风清云淡的秋日，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会上，两位穿着橘黄色缎袍的人大代表引起众人的瞩目，他们就是来自西藏的佛爷达赖和班禅。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班禅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府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当时，达赖19岁，班禅16岁，他们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同他们共度藏历木羊新年，与他们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



1954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西藏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右）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左）。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⁹³毛泽东特意指出，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不能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毛泽东还身体力行，当他接见的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毛泽东将“团结、进步、更加发展”八个字作为临别赠言，送给达赖和班禅。后来这八个字就成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二年，陈毅副总理到西藏时，代表党中央正式作了传达。再后来，“团结、进步”这四个字被镶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大铜门上，成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与工作的主题标识。

1955年3月11日，在离京返藏的前一天，达赖要见毛泽东，毛泽东深夜穿着睡衣急匆匆亲临达赖的寓所为他送行。当时在场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事后说，就他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穿着睡衣出中南海，只有两次。

达赖被感动了，他坚定地表示：“中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正在日益走向亲密团结之中。”“在先进的汉民族的帮助下，在我们各民族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我们有坚定的信心……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政教昌盛、繁荣幸福的地方。”⁹⁴

班禅被感动了，他动情地说：“三年来，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是伟大的、正确的，全国各兄弟民族对西藏人民是热爱和帮助的。”⁹⁵

西藏人民被感动了，他们把这一历史事件画在了1956年落成的罗布林卡达赖新宫“达旦明久颇章”中描绘西藏历史的藏式壁画上，并纷纷把毛泽东主席与达赖、班禅在北京欢度藏历木羊年时的合影挂在自己的家中。

这一历史事件不但被画进了西藏壁画，还被永远写进了新中国民族关系的史卷，成为其中辉煌的一页。

透过这一历史事件，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少数民族的真心尊重，对

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真诚追求。

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中,西藏始终是境外学者、媒体关注的焦点。为揭开西藏“神秘”的面纱,他们纷纷赴西藏实地考察,在领略西藏美丽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见证和感受了西藏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中写道:“1959年,只有100万多一点的西藏人生活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现在的西藏人口已经上升到了400多万。1950年前,西藏人口中最多的就是农奴(90%以上),而封建贵族和僧人是统治者。所有的寺院都有大量土地和房产。农奴从生到死都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当时西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6岁,1950年以来他们的平均寿命已经上升到了65岁。西藏的经济也保持着高速增长,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达14%。……西藏人享有众多特权。在中国,致富的关键在于教育。过去,教育是僧侣和贵族才能享受的特权,现在所有西藏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且他们的高考成绩只要达到其他地区的一半就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西藏积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图为成群的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动物藏野驴在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的草原上奔驰。

可以进入一流大学就读。西藏人可以生3个孩子，并且仍然可以享受国家所提供的福利。而在过去，他们一无所有。而汉族人仍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为西藏留出了一定席位。”⁹⁶



2011年4月23日，安徽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西藏班学生罗布（右二）在图书馆里与同学们一起阅读新书籍。

《印度教徒报》的记者梅农2007年应邀赴藏采访后，在印度《前线》半月刊先后刊发题为《转型中的西藏》和《生活幸福是现代西藏社会的显著特征》的文章。他指出，自1951年以来，西藏每个领域都发生了

现代化变革，藏民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已判若两样，西藏已成为一个有相当发展水平的地区。《印度教徒报》的总编辑拉姆通过2000年和2007年两次到西藏实地考察，认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惠藏政策对西藏发展的作用，他指出：

“通过公正、客观的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对待其少数民族方面做的比中国对藏族人民做的逊色得多。”

西藏的变迁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变化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据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全中国共建立了民族文化事业机构达10282个，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总数为2199.6万人，少数民族干部达290多万人；自2001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77899亿元，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30626.2亿元，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4000多万人减少到770多万人，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的县已有674个，占总数的96.6%。

这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就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关注。长期在中国考察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尼古拉斯·泰普赞叹:中国的民族政策“令人赞赏,值得世界上许多别的国家借鉴”⁹⁷。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路易·瓦格斯说:“我们了解到的中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确实值得全世界去学习。在许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里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局面。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多种可行方法中的一种,而我认为这种方法值得世界倾听、学习,因为它取得了很好的成果。”⁹⁸美国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知名专家格兰德尼则联系新疆的实际说:有人抱怨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了“经济歧视”,甚至批评说中国对新疆实行移民政策,试图改变当地的民族结构。事实上,“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相当开明”。中国政府始终在就业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给予特别关照,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双语教学,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等。⁹⁹

开明的民族政策使中国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正当西藏、新疆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幸福和安宁时,劫难突然降临。2008年3月14日上午,“阳光城”拉萨,一些不法分子呼喊着“西藏独立”之类的口号,丧心病狂地焚烧过往车辆,袭击无辜群众,打砸公共设施,哄抢店铺商场。此后,四川、甘肃、青海藏区的个别地方也出现聚集闹事和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7月5日,类似的事件在新疆乌鲁木齐再次上演。这两起事件,给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给当地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

事后调查得到的事实证明,西藏拉萨“3·14”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是中国境内外“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社会因素而非民族宗教因素,是少数不法分子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挑起事端,策动民族分裂,干扰中国发展。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部署,从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法制和西藏、新疆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紧密团结各族群

众，迅速依法采取措施，果断平息了暴力事件，得到了包括西藏、新疆各族群众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支持。一些外国专家学者指出：这两起暴力事件“如出一辙，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国外黑手操纵”，此种暴力犯罪“为任何国家所不容”。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维护稳定是在“恰当的时间采取的正确步骤”，是每个法治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做的事情。¹⁰⁰同时，针对工作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为了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央继续加大对西藏发展与改善民生的投入，就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新疆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西藏和新疆到处呈现出团结、祥和、加快发展的气象。2011

年5月15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库热西·买合苏提就新疆的发展变化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现在“人们更加百倍地珍惜新疆稳定的大好局面，更加坚定了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信心，特别是坚定了加快新疆发展这样一个信心、这种愿望和盼稳定、盼和谐、谋发展、谋富裕这样一个局面已全面形成”，

“新疆现在确实确实是人气旺了、人心暖了、动力强了、信心足了。热情好客的新疆各族人民期待着大家随时到新疆旅游、考察、观光”。



2009年9月4日，在第十八届中国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上两位国外参展商被维吾尔族小花帽所吸引。此次洽谈会共签订内联和外经贸项目近160个。自2011年起，乌洽会升格为中国—亚欧博览会。

无神论者面对 宗教

20世纪初,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诞生的前夜,列宁集中精力研究了社会主义的宗教问题,写下了《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等名篇,提出了一个复杂、敏感的政治课题: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世界观上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包括无神论),与一切唯心论(包括有神论)相对立。不信神的执政党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难题。

以后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执政党为解决这一问题都进行了大量、认真的努力,但基本都失败了。破解这一难题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生前津津乐道一段往事: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回忆,当年在延安,有一天,毛泽东出门散步,提出要到一座寺庙去看一看。警卫员不解,说那是迷信,有什么看头?毛泽东大声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

说“宗教是文化”,这是一种既浅显又深刻的理念。这意味着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即是对文化的尊重,意味着处理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化,意味着不能把宗教当做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革命斗争需要团结发动群众的现实,中国共产

党鲜明地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认真严格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回民比较集中，边区政府十分注意尊重和保护伊斯兰教。当年，边区政府不但颁布了大量尊重和保护伊斯兰教的文件，在激烈的战争之余，还在境内回民集聚区先后帮助建立起5处清真寺。毛泽东亲笔为新建的延安清真寺题字。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载：1941年时，边区境内共修建清真寺14座，“边区凡有回民之处，均有清真寺”。两度访问边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小心翼翼”一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尊重宗教的程度，他说，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¹⁰¹

正因为共产党对宗教信仰自由“小心翼翼”地尊重和保护，使得边区宗教得以自由发展。据统计，在这个人口仅约150万的边区，1944年有天主教堂20多处，基督福音堂7处，佛教寺庙8处，清真寺10余处，还有道观等，信教群众4万余人。¹⁰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上升为全国执政党，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但共产党没有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而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苏区、抗日边区和解放区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向了全国。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¹⁰³“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¹⁰⁴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50年代上半叶，“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¹⁰⁵ 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一个地区，几乎全民信教，当地宗教政策执行的情况在全国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1954年9月，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

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西藏人民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经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¹⁰⁶一位后来去了美国的西藏喇嘛回忆说，直到1959年，他在康区各地广泛旅行，当时他的宗教活动或研究没有受到一次干扰。¹⁰⁷英国记者艾伦·温宁顿则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证实了达赖发言和西藏喇嘛回忆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他说，自己1956年在拉萨访问时“从来没有碰见一个对宗教抱有任何怀疑的西藏人”。¹⁰⁸



2011年3月6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右)正与其他宗教界委员就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展开热烈讨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左倾，信仰自由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探索曾走过一段弯路。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现了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破解宗教难题的努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开始。

1980年，邓小平说：“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利益相违背。”¹⁰⁹邓小平在新中国

成立后很少讲宗教问题，但这一段话非常经典。话不多，但含义深刻，它将对“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探索重新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对破解这一难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1982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承认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合法的存在，还会长期存在，指出“党的宗教政策，决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强调“必须真诚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¹¹⁰

200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成立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宗教工作的高层会议。这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人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对宗教问题的探索成果提炼升华，提出社会主义的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三个特点，其中最根本的是长期性。会议指出：“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认识根源的消失，则需要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宗教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¹¹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观察宗教得出的科学认识。

以这一科学认识为理论依据，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共十七大又重申了这一方针，并把它载入了新修订的党章总纲。

在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宗教活动得以规范有序地进行，宗教发展进入了平稳健康的“黄金时期”。据统计，目前，中国信教人数有1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活动场所约13万处，宗教团体近5500个，宗教院校110多所。各宗教都办有自己的刊物，出版了一大批宗



2010年11月17日,新疆喀什穆斯林迎来伊斯兰教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穆斯林群众最为隆重的节日。

历史的
轨迹

中国
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教经典书籍。如,自1980年至今,中国基督教会累计印行《圣经》达7000万册,共22种版本,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教会。

1998年2月,美国全国福音教派协会主席唐·阿格牧师来到中国,在亲眼目睹了中国宗教的真实状况后,由衷地说:“中国可能正在经历着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而这场复兴绝大多数是在官方的默许下发生的。”¹¹²

两年后,英国记者布兰登·奥尼尔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西藏之行。2010年7月29日,他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称:“当你第一次来到西藏,你会对这里藏民所享有的宗教自由留下深刻印象。曾听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的活动人士称,中国当局试图‘消灭藏族身份和文化’。然而,当我发现藏民实际上每天都能基本不受阻碍地从事宗教活动时,我感到非常惊奇和欣慰。”

“党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秘诀,就在它的原则和政策里。”¹¹³ 曾长期担

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叶小文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中共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的“秘诀”,出色地破解了“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这一政治难题,续写了“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新篇。

